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全注新译精讲丛书

人物志

[三国魏] 刘 邵◎著

许嘉璐◎主编

吴家驹◎译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全注新译精讲丛书

人物志

[三国魏] 刘 邵 著

许嘉璐 主编

吴家驹 译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志 / (三国魏) 刘邵著 ; 吴家驹译注.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2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全注新译精讲丛书)

ISBN 978-7-214-22415-6

I. ①人… II. ①刘… ②吴… III. ①人才学—中国
—三国时代②《人物志》—译文③《人物志》—注释

IV. ①C9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1787 号

书 名 人物志

著 者 [三国魏] 刘 邵 著 吴家驹 译注

责任编辑 陶方舟

责任校对 洪 扬 单丽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415-6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全注新译精讲丛书

编纂委员会

主 编：许嘉璐

顾 问：周勋初 李学勤 张立文 周桂钿

副主编：王华宝_(常务) 方 铭 朱小健 张 强

总策划：严 军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久富	王云路	王立群	王志民	王继如
方一新	方向东	方 勇	朱汉民	朱易安
乔光辉	刘毓庆	孙中原	杜晓勤	李炳海
杨庆存	汪启明	张 弘	张 兵	张新科
张新斌	陈延斌	陈 虎	陈尚君	陈 洪
武秀成	欧阳哲生	尚学峰	府建明	郑杰文
赵兴勤	赵逵夫	郝润华	党圣元	钱宗武
郭齐勇	郭 杰	曹书杰	梁 枢	董志翹
董 群	韩德民	程章灿	傅道彬	鲁国尧
詹杭伦	詹福瑞	廖可斌	廖名春	滕志贤

出版说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实现伟大复兴的“根”和“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了全面部署。本着“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精神，为方便传统文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选好经典、学好经典、用好经典，我们编纂了这套《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全注新译精讲丛书》。

在经典选择上，本丛书重视中华文化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既有代表儒家思想文化的经部名著20部，又有体现学术思想异彩纷呈的诸子作品60部；既有世所公认的史学名著30种，又有作为各时代文学艺术符号的文学经典40种；同时，兼顾普及性与现代性，选择了童蒙读物及家训经典10种。希望通过这160部经典，勾勒中华文化大貌，呈现中华文化的历史源流、思想精神和总体特征。

在内容呈现上，本丛书设置了融导读性前言、原典、题解、注释、翻译、精讲或赏析、附录为一体的编纂体例，并倡导坚守学术“匠心”。每部经典均选取学界公认或影响力最大的版本为底本，并匡谬纠错，遍采诸家之长，吸收最新成果。题解用以说明各篇（或卷、章）的写作背景、主要意旨、基本结构。注释力求简明，与译文互补，对生僻字词、

典故名物等予以解释，阐明文义、典源；对生僻、多音字词给出注音。译文以直译为主，追求准确、流畅、优美；诗歌类作品以意译为主，尽量保持诗味。精讲分为两类：思想类的经典重在揭示精神内涵，发现现代价值；文学类的名著则侧重赏析、探究，以引导审美鉴赏，领悟艺术特色。

本丛书特别重视以新时代的文化精神与全球化视野深入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对当下世界的意义，力求版本权威、文本准确、注释简明、译文流畅、评析精当，集校、注、译、讲为一体，融优美文字、原典精神、全球意识、当代审美为一炉，形成系统性与权威性相结合、实用性与现代性相结合、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针对性与前沿性相结合的特色。

在传播形态上，为打通“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出版、传播、应用、转化”全链条，充分开发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推进“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出版的融合与创新，春雨教育集团同时启动了“中华传统文化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并将在形成完善的全本文本之后，分层开发教育读本、精选读本与音视频等多媒体读物，为传统典籍与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之间架设桥梁，期待通过激活经典，借助文化认知和经典滋润，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凝聚天下共识，形成全新的文化传承体系，并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本丛书是一项历时久、耗费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数百位专家学者参与撰稿，20余位资深出版人参与审读，并聘请了多位德高望重的学界耆宿担任学术顾问。大家齐心协力，共襄盛举。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书中疏漏不当之处，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物志序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

逸

情導於外而形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
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
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
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
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延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人物志卷上

魏 劉劭 撰

涼 劉昞 注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
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

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知無
形狀

故常人不能觀惟
聖人目擊而照之

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

質不

至則不能涉
寒暑歷四時

稟陰陽以立性

性資於陰陽故
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



前言

《人物志》作者刘邵（一作劭，又作邵）^①，字孔才，三国魏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约生于汉灵帝建宁（168—172）年间，卒于魏正始（240—249）年间。历官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卒赠光禄勋。《三国志·魏书》有传。刘邵曾奉命编纂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受诏制定《新律》，著有《律略论》《都官考课》《人物志》《乐论》等百余篇。其中，以《人物志》最为著名。

全书三卷十二篇，是一部关于品鉴人物才能与情性的专书，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系统探究选才用人的理论著作。

^①《三国志》作“劭”；《隋书·经籍志》作“邵”；北宋人宋庠《人物志·记》考证两者皆误，应为“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纳该说。本书按多数文献的习惯称法，仍作“邵”，特此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人才思想源远流长，翻开先秦典籍，诸如《论语》《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大量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但都散见于某些篇章之中，而没有产生过一部专著，这种情况直到三国时期才被打破。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品鉴人物为内容的著作，如魏文帝的《士操》、魏司空卢毓的《九州人士论》、吴姚信的《士纬新书》、佚名的《通古人论》。但由于种种原因，除刘邵的《人物志》外，都没有流传下来（《士纬新书》存少量佚文）。而《人物志》以其系统缜密的思想，受到古今政治家和学术界的推崇，成为中国人才学的经典之作。

为什么三国时期会出现人才研究的高潮并产生《人物志》这样的重要著作呢？

首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豪杰欲成大业者，都把网罗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得人才者得天下，成为一时共识。

曹操曾与袁绍讨论过依靠什么平定天下的问题。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反驳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指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当时的魏、蜀、吴三方都极为重视人才。曹操多次颁布《求贤令》，反复强调“唯才是举”。刘备从聚众起兵到赤壁之战的数十年中，寄人篱下，无寸

土立足，但为实现匡复刘氏天下的大业，四处奔走，延揽诸葛亮等一流人才作为辅佐。雄踞东南的孙权也不甘落后，他遵兄遗嘱，“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诚如清人赵翼所言：“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辅，以成鼎足之势。”（《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其次，两汉以来选官制度的弊端，此时已暴露无遗，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汉代选官，采取察举与征辟的方式。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官员以“贤良”“孝廉”等名目，将有名望与德行的人推荐给朝廷，经考核，委以官职；所谓征辟，就是由朝廷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征聘人才。这两者都以对人物品行的评论考察为依据，因此，舆论的作用至关重要。但由于政治的黑暗与腐败，舆论基本上为世族名士所垄断，加上贿赂请托之风的盛行，沽名钓誉之徒趋之若鹜，以致“选举乖实”，成为普遍现象。

魏文帝时颁布“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为九等，由州、郡大小中正品评本地士人，上报朝廷录用。制定这一制度的初衷，“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但由于担任中正的官员多为大族名士，他们的私家操纵反而因此获得合法地位。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并未改变“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格局，反而引起新的矛盾，因此受到众多非议。人才选拔，出路何在？一时成为统治阶层与士人关注的焦点。

第三，刘邵所处的时代，思想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汉以

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格局在汉魏大动乱中受到严重冲击，经学衰微，道、法、名、阴阳、兵等家复兴，学术领域出现了又一次争鸣的高潮。在这次高潮中，名家重新受到重视。名家又称形（刑）名之家，或称辩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而此时的“名家”学说，又在汉末清议的基础上发展为儒道兼综的名理之学。主张考核名实，辨名析理。在人才品藻上更注重于名实之辩，并由对具体人物的评议逐渐转向对抽象理论的探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与人才选拔有关的著述或政令法规，如徐幹的《中论》、刘廙的《政论》、曹操的《求贤令》、诸葛亮的《兵要》、陈群的《九品官人法》等。

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活动经过长期的积累，需要加以总结，而曹魏政权对人才的需求，又迫切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指导，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刘邵的《人物志》应运而生。

《人物志》的成书时间，无文献记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只能推测，似应告竣于魏正始年间。一方面，因为此前的景初（237—240）中，刘邵曾奉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但这一考课法在朝廷讨论时受到大臣傅嘏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刘邵：“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三国志·魏书·傅嘏传》）傅嘏的指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用人方面的流弊，本源于政治制度与官制建设上的偏差，不从根本上入手，而只是孤立地在综核名实上做文章，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而刘邵在《人物志》一书中，多处探讨了理想政治的问题，并以周代官制为依据，区分人才类别，列举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为各类人才的代表，这似乎是对

傅嘏等人指责的一种回答。从这一点来说,《人物志》成书于《都官考课》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正始年齐王曹芳登位,作为前朝老臣,刘邵未受重用,于是执经讲学,因此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总结长期以来人才研究的成果,最终完成这部著作。

二

《人物志》书前自序,阐述了写作动机和理论依据,指出“知人”是贤明君主聪明才智的显著标志和最宝贵的品质。因为只有正确地识别人才、使用人才,“众材得其序”,才能使“庶绩之业兴矣”。正文十二篇,每篇独立命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人才问题。下面,试对其思想内容作一些归纳与分析。

(一) 人物材性鉴定的基本原理

材性指人的资质禀赋。关于材性问题的讨论,是古代哲学、心理学、人才学上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魏晋时期,围绕这一课题爆发过一场大辩论。辩论依观点的不同分成四派,钟会曾总结这场辩论,写成《四本论》,可惜此书已经失传。刘邵是参加辩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他的《人物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以品鉴人物材性为内容的著作。

由于人是极其复杂的认识对象,这就带来一个能否认识和鉴定的问题。《九征》篇中,刘邵从哲学的高度,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尽管“情性之理,甚微而玄”,但仍然是有迹可寻的,因为“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刘邵继承了先秦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生成学说,认为人的血气、形体都是由元气、阴阳、五行决定的,物质先于精神,精神

依托于形体。

具体地说，刘邵认为人体的筋、骨、血、气、肌五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五物之实，各有所济”，形成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五种相应的素质，称五质。五质又象征仁、礼、信、义、智五种道德准则，称五常。五常又表现为“温直而扰毅”“刚塞而弘毅”“愿恭而理敬”“宽栗而柔立”“简畅而明砭”五种品德，称五德。刘邵认为，材本于质，一个人，不管如何“体变无穷”，都依乎“五质”。所有见乎形容、著乎声色、发乎情味的征象，都是“五质”的具体表现。他说：“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材性鉴定因此而具有可行性。

进一步，刘邵将这种内外联系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怛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谓之“九征”。主张通过人的风度、仪表、言谈、举止、气色、眼神、外貌、声音、精神等外部特征，对人的内在质性作具体全面的考察。

“九征”说的基本思想是：人的心理素质会通过形体的外部活动表现出来，因此，人物鉴定可以通过观察人的外部表现推知其内在的质性，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但刘邵的理论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如筋与勇怯、骨与强弱，并不一定都有必然的联系。机械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否认了心理品质的社会属性而带有某种生理决定论的错误，这是需要注意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唯心主义和谶纬迷信之风盛行的汉魏时期，刘邵关于人物材性可以鉴定的理论，对于人才研究无疑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二）人才的分类与品评标准

刘邵依据人物材性各异的特点，将人才分为“三类”“十二材”。

“三类”，指品德高尚完美的兼德之人、德才兼备的兼材之人和才高德下的偏材之人。兼德之人，“九征皆至”，具有中庸之质，属于君主之才，是为圣人；兼材之人，九征“具体而微”，是臣材中的杰出人物，可领总管之任；偏材之人，具备“九征”之一，其德与中庸无涉，其材工于治事，是能胜任某一方面职务的人臣材料。

这三类人物，又归纳为君材与臣材两种类型。臣材是《人物志》探讨的重点，“十二材”就是刘邵以治国人才的不同特点和国家的重要职位为依据，对臣材所作的具体分类。他们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和雄杰。这十二种人质性不同，才能各异，所任官职亦有所区别：清节家，“德行高妙，容止可法”，可担师氏之任，掌管教育；法家，“建制立法，强国富人”，可担司寇之任，掌管刑法；术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可担三孤之任，掌朝廷谋略；国体，“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可担三公之任，掌以相印；器能，“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善理庶务，可担冢宰（相当于吏部尚书）之任；臧否，“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可担师氏的佐官；伎俩，“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可担司空（相当于工部尚书）之任；智意，“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可担冢宰的佐官；文章，“能

属文著述”，可担国史之任；儒学，“能传圣人之业”，可担安民之任；口辩，“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可担行人（使臣）之任；雄杰，“胆力绝众，材略过人”，可担将帅之任（《流业》篇）。

从上述分类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邵关于治国人才的划分，是从“德、法、术”三方面展开的。十二材中，前八种以“三材”为本，长于治事，但又有主次之分。其中，臧否、伎俩、智意、器能分别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的次流，专长于某一领域，属专家型人才。刘邵划分人才类型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正确地使用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特点和作用，以共同治理好国家。

在类分和品评人才的标准上，《人物志》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第一是以中庸为人才的最高标准。刘邵说：“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他认为具有中庸质量的人，“五质内充，五精外章”，“阴阳清和，中睿外明”（《九征》篇），是最为理想的人物，因称之为圣人，是为君主之材。

第二是仁德与才智并重的原则。东汉选才，以德为先，堕入流弊。刘邵在重视德行的同时，充分强调人的才能智慧。人臣之中，刘邵最推崇国体之人。因为国体之人德才兼备，“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隼”（《材能》篇），堪当宰相之任。而偏材是刘邵论述的重点，偏材者，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工于治事，他们占了人才的大多数，这是刘邵论述的重点。

第三是平淡与聪明兼备的人才思想。他说：“圣人之所美，莫美乎聪明。”又说：“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自序》）

聪明指一个人的才华智慧；平淡则可理解为锋芒内敛，不争不伐，大智若愚，澹泊明志。“平淡”两字，看似无奇，其实包蕴着丰富的内涵。平淡不是平庸，不是无所作为，而应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那种平淡，是一个人才品性均衡发展至高层次所自然显现出来的平和之质。刘邵的这一观点，闪烁着辩证思维的光芒。

需要指出的是，刘邵关于中庸的理论并不等同于儒家的学说。他说：“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九征》篇）又说：“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殒，淡而不醜。”（《体别》篇）这和老子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第三十五章》）如出一辙。显然，刘邵在解释儒家中庸之道时，掺入了道家无名的思想。在他看来，只有具备澹泊情怀的人，才能包容各方力量，成就宏伟事业。这反映了曹魏时期各家思想融合的时代特点。

（三）识别人才的方法和途径

如何识别人才？刘邵提出“三谈”“五视”“八观”“九征”等方法，其中，“八观”法和“五视”法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所谓“八观”，一是“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是“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是“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是“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是“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是“观其情机，以辨怨惑”；七是“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是“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八观》篇）“八观”法从人的情感、举止行为诸方面入手，观察人的心理品质和材性特点。例如，从人情感的